

风雨兼程四十年

——改革开放以来军旅小说回望

■朱向前

文艺观察

观文艺之象，发思想新声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当代军旅小说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二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军旅长篇小说的浪潮；三是新世纪初年军旅小说的第四次浪潮；四是“新生代”军旅作家在更广阔空间的崛起。

一

新时期伊始，思想解放运动如春风吹拂文化原野，中国当代文学迎来了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军旅小说有一点滞后，虽然有徐怀、邓友梅等发表了《西线轶事》《追赶队伍的女兵们》等名作，但还是单兵作战，难成阵势。

真正标志着新时期军旅作家集团冲锋的“信号弹”恰是1982年间朱苏进《射天狼》和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两部中篇小说“一南一北”的问世，它不仅宣告了新时期青年军旅作家的集群崛起，拉开了新时期军旅小说进入高潮的序幕，而且以此为象征，开辟了反映“和平军营”和“当代战争”的两条战线，昭示了一大批青年军旅作家在这两条战线大显身手。

待到1986年，莫言的《红高粱》又开辟了第三条战线“历史战争”，引导了一批没有战争经验的青年军旅作家写出自己心中的战争。至此，“两代作家三条战线”的创作格局基本形成，新时期军旅文学也借此进入全盛时期，掀起了新中国军旅文学的“第三次浪潮”。

1980年代的军旅小说紧随时代步伐，以思想解放为发动，汇入现实主义深化的大潮之中，在三个层面上急速向前推进。一方面是在思想深度上，向现实主义的深部和细处挖掘，寻觅和平时期军人的历史定位和战争中人性的裂变与闪光，在颂歌与悲剧的讨论中摸索英雄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辩证

把握；二是在题材广度上，从雪山哨卡到火箭基地，从女兵王围到受阅方阵，从将军到士兵，从历史到现实，从天空、海洋到陆地，展开了广阔壮丽而绚烂的人民军队生活画卷；三是在艺术形式上，继承传统而超越传统，立足本土又面向外域，在叙事结构、语言修辞和感觉方式等诸多方面不断接受挑战，变革前行。

1980年代的军旅小说完成了革命性突进，涌现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名篇和才华横溢的优秀作家，部分作家作品甚至已经表现出了努力与世界战争文学对话的追求，军旅小说再度成为当代文学独特而无可替代的组成部分，为新时期文学的繁荣进步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二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骤然加速的社会转型带来了文学的失重，更带来了军旅文学的失位，面临着“消解”的严峻挑战。这种“消解”来自两个层面，表层是更多的散兵游勇式的个人化的“写作活动”取代了“集团冲锋”。深层的消解则表现为军旅文学意识形态色彩的淡化，它牵涉到军旅作家如何将一种政治的优势转化为艺术的审美的优势及相关叙事策略。

挑战与机会并存、淘汰与新同在的双向动态演进中，军旅小说和作家队伍出现了新的景观。一批崛起于1980年代的青年作家，艺术技巧、思想修养和生活积累都趋于成熟丰满，开始跃进一个新的境界，创作重心从中篇小说转移，先后创作出了《炮群》《醉太平》《穿越死亡》《孙武》《末日之门》《遍地葵花》《兵语》《走出硝烟的女神》《突出重围》《英雄无语》《历史的天空》《亮剑》等长篇厚重之作，不仅弥补了1980年代军旅长篇小说“歉收”的缺憾，而且还使长篇小说取代了中篇小说，成为了1990年代军旅文学的主要风景。

作家们以更加个体化的“青春角度”切入当下的军旅现实生活，以浓郁的自传色彩和个人人生经历或心

灵历程，真实自然地流露与传达出了军队现代化进程中当代士兵的体验和情感，并以此填补了前代作家在追踪现实军营生活方面逐渐“淡出”的空白，再次印证了反映军队生活的文学必须在不同的时代找到不同的代言人的特殊性。而通过农家子弟入伍从军折射出农业文明与现代文明相碰撞的“农家军歌”，则是一个阶段内新军旅小说的“主旋律”。继老一代长篇军旅小说作家之后，新一代中年的长篇军旅小说作家日渐成熟，他们送来了军旅长篇小说创作大潮的隐隐涛声。

三

进入21世纪，军旅长篇小说佳作涌流，连绵不绝。军旅作家再次“突出重围”，以长篇小说的繁荣为标志，掀起了当代军旅文学的第四次浪潮。它和“前十七年”以长篇小说为主体的两次浪潮形成了一种遥相呼应，而且从数量和质量上都是一种继承、拓展和超越；它和以中短篇小说为主体的第三次浪潮构成了一种对比与补充，而且从中短篇到长篇，本身就是一种发展、承接和深化。

“第四次浪潮”中出现的军旅小说作品，不仅可以在纵向的比较中显出新的特质，就是横向——置于当代文坛一流长篇小说中比较，也有相当一部分毫不逊色，它们在“茅盾文学奖”、国家图书奖等重大奖项中频频折桂或入围，足以证明社会和文坛的认可；军旅文学有了一支成熟稳定的长篇创作队伍，他们当时年龄多在40至50岁左右，正富于春秋，经验老到，处于创作旺盛期，并有可持续发展的后劲；以这批作家作品为辐射，他们编剧、改编或被改编的电影、电视剧（如《和平年代》《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士兵突击》等）热播不衰，充分显示了军旅长篇小说（作家）雄大深邃的“酵母”作用，和它们借助影视传媒成倍放大的幅面辽阔的覆盖力量，形成了新中国军旅文学史上最为缤纷多元、气象万千的雄浑景象。

四

继军旅文学的“第四次浪潮”之后，“新生代”军旅作家浮出水面，从业余走向专业，从青涩走向成熟，渐次成为了军旅文学的希望和未来。他们之中的佼佼者已经在当代文坛初露峥嵘。“新生代”军旅作家在成长之初缓解了新世纪军旅文学出现的“孤岛现象”，他们的创作成果大多体现在中短篇小说领域，数量可观，并在质量上有着较高的艺术水准。

“新生代”军旅作家的成长环境决定了这些作家再难复制前辈们深切的战争亲历和磅礴的集体疼痛，也因此，他们的创作更多的是从个体角度切入生活，显示出迥异于老一代军旅作家的叙事范式 and 美学风貌，这既显露出新世纪军旅文学与其承接的“新时期”军旅文学之间创作生态环境以及文学观念的代际差异，也彰显了“新生代”军旅作家在新世纪语境下试图构建独立美学追求的创新精神和自觉意识。

“新生代”军旅作家大多数有着广阔的文学视野、扎实的文学训练和一定的基层部队生活经验，各自从熟悉的军旅生活出发，营造属于自己的一方“营盘”，写下了一系列暗含个人成长经历、富有个性化叙事风格的小说。然而，当“新生代”军旅作家所描摹和绘制的“军营现实”进入到一种过于私语化的境地而无法寻求突破时，他们笔下的军旅生活的面目就显得稍嫌狭窄了。

作家们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近几年，在完成了最初的对军营生活的回顾之后，部分“新生代”军旅作家主动突围，密切跟踪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在更为广阔的军旅生活土壤中寻觅新的写作资源，他们的新作显示出主动向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等军旅核心价值观的积极靠拢，并从中引发出独特的思考，建构起个性化的风格。

回望昨天，风雨兼程四十载；展望未来，追云逐梦八千里。在今天中华民族努力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当代军旅小说完全应该也更有可能是为中国军队谱写写出与时代同行的、辉映强军梦想的宏伟篇章。

锐视点

探研本质，开启新知

金秋时节，由军旅作家唐栋创作的大型话剧《柳青》在西安成功上演。作品以老作家柳青放弃城市生活、扎根陕西皇甫村14年创作《创业史》的故事为主线，以柳青与当地村民共同生活、融为一体、经历为主要内容，成功塑造了一个植根于生活沃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人民作家形象，也详尽描绘了淳朴的关中平原的风土人情和人物群像。

这样的一个人具有典型意义的主旋律题材，很容易写成高大虚无的一部典型模范人物的传记。但是唐栋创作的话剧《柳青》却以细腻真实的叙述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可观可感的柳青形象，呈现了一位人民作家的艺术人生。开始时，柳青的确是来体验生活的，甚至穿比较洋气的背带裤。等来到皇甫村，他渐渐被“翻身”农民的热情和农村新形势所感染，自然，他的心也进了农村，感情也进了农村。他的言语衣着都成了地道的关中农民，但柳青骨子里又很现代，他会外语，阅读量很大，虽身在乡村，但眼光并不局限，国际新闻、文坛思潮都了如指掌。这个时候，他不仅仅是为了创作，而有了一种今天作家所缺乏的使命感，进而才有了参与农村事务的种种行为，他渐渐地成了一个农民、一个乡村的基层干部。所以他笔下的《创业史》，带着关中平原的泥土芳香，当年一出版就洛阳纸贵，使柳青声名鹊起。直到今天，我们读《创业史》，依然可以被柳青对土地和人民的特殊情感深深打动。他是写土地和人民，在写作过程中，他自己真正成了土地和人民的儿子。这就是《创业史》成为不朽名著的原因。话剧《柳青》何以能催人泪下，正是因为作品把柳青的人生和《创业史》的故事以及皇甫村所折射的五十年的农村生活有机地融合一起，写出了一个人物与人民之间那种血脉相连的关系。

唐栋本来是一个从关中原走出来的军人出身的作家，对这片故乡的土地，他有着与生俱来的情感，熟悉生活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为了写好《柳青》，他依然坚持学习柳青扎根生活的毅力和决心，持久地深入故乡的土地，重新按照小说上的故事去寻找柳青当年生活的足迹，认真体验柳青的生活道路，一部《创业史》，他反复阅读数遍。其实，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各界推崇《创业史》，但相当多的人并不知道，《创业史》是怎么写成的，更不了解柳青是如何深入生活、又如何从生活走向艺术的，更不明白柳青以毕生精力这样实践的意义到底何在。唐栋笔下的话剧《柳青》不仅写了《创业史》中的原型人物以及故事，而且写了柳青一个作家是怎样开始和农民交朋友、后来又怎样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再现于舞台上的感人情节，更多地来源于作家对生活的真实体验和积累，也是剧作家唐栋的生活积累。

作为军旅作家，唐栋已经完成了数十部话剧创作，清一色的主旋律，清一色

植根于生活的沃土

■陈先义

的正能量。但承担《柳青》这样一个创作任务，很多资深剧作家都认为，这是颇为难写的一个题目，很多人对能否写好《柳青》心存疑虑，一是主人公本身就是一个文学大家，二是被写的事迹和人物本身就是主人公写的小说中的人物，其难度之大，可以想见。但是，唐栋知难而上，用多重空间的交错展示，把柳青创作境界和人生境界融为一体，把戏剧人物和真实人物交错展现，把柳青人生和他表现的人物命运互相照应，多条线索相互交织，最后聚焦在一个植根于人民的作家柳青形象的塑造上。这种创作手法，不但为戏剧创作赋予了崭新的意境，也为同类题材的创作开了新面。作家紧紧抓住了柳青这个人物独有的深度，回答了当下人们陷入困惑并迫切需要回答的创作与生活的关系问题，并且做了非常生动的解读。

中国文艺发展到今天，确实必须面对如何摆脱市场束缚、如何避免做金钱奴隶的诸多困惑。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倡导扎根生活，重新研究怎样扎根人民，特别是按照习近平主席要求的“用心用情用力”讴歌人民、讴歌英雄，就显得迫切而重要。因此，话剧《柳青》的推出就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尤其会对作家、艺术家怎样深入生活的问题带来借鉴和启示。

向历史深处掘进

——以王龙的非虚构写作为例

■刘小泳 何培军

佳作快评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军旅作家王龙凭借其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成熟自如的语言，完成了以王安石变法为主题的非虚构作品《壮丽的荒芜事业》，获得了业内关注。对于王龙在非虚构写作中这种孜孜探索的艺术勇气，有关专家给予了充分肯定：“王龙的非虚构作品常关注重大的人类命题。他对历史、战争及时代命运的思考令人印象深刻。作品具备明确的现实意义，充分彰显了正面的时代价值观。”

王龙近年来潜心历史、军事题材创作，著有长篇历史散文集《远去的身影》《山河命数》和长篇纪实文学《重兵汶川》（合著）、《刺刀书写的谎言——侵华战争中的日本“笔部队”真相》等书，引起海内外专家和读者的关注，曾获冰心散文奖、四川文学奖、全军文艺优秀作品奖等奖项。

当今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凝视对视从未如此接近。如何通过千年历史镜鉴复杂现实？回望坎坷来路，中国人如何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让前人的经验和教训给后人以镜鉴启迪，让先行者的足迹带给后人更加清晰的思考？这些都是王龙这些年在历史题材非虚构创作中苦苦探索的向度。

历史研究的手段必须不断推陈出新，历史题材创作才能与时俱进。为此，王龙将一种独特的研究方法引入历史非虚构创作领域，那就是“比较

史学”。比较史学是历史学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它将古今中外的诸种重大历史现象，即处于大致同时代的不同国家、制度、事件、人物进行纵向或横向、宏观或微观、类型或源流的比较考察，力图从历史的异同现象中去揭示科学的历史规律。王龙尝试把千年中国的重大人物、事件和制度放在世界大棋局中进行审视分析，以理性眼光反思东西方文明的成败得失，用中西方对比剖析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为中华复兴伟业探寻更广阔的参照坐标。他开始在历史长河中经历冰山激流、越过沉船暗礁，去进行一次次令人深思浩叹的文化探究。

2009年底，王龙独辟路径开拓出“中西人物对比写作”，即通过康熙大帝和彼得大帝、慈禧太后与维多利亚女王、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等主导国国民生的著名人物，在国运浮沉的十字路口不同的政治作为、人生选择和命运结局，透视近代中国迷失落伍的深层原因，剖析大国兴衰的关键节点。抽丝剥茧层层深入的剖析，让我们看清中西方英豪的风云对决、大国浮沉的拍案惊奇。王龙对于国民性格的“硬心肠”式的反思颇具功力。那些历史人物的焦灼与悲欢、智慧与迷茫、勇敢与无奈，无不体现出一个个时代的侧影。

严肃的历史文学写作，应该有助于在全球化背景下发掘重建新的中华文明价值体系。著名作家王树增也深为这位军中同行者的勇气感动，给予真诚的鼓励：“那些历史人物的焦灼与悲欢、智慧与迷茫、勇敢与无奈，无不体现出一个个时代的侧影。”

王龙认为，东西方任何一种文化

形态都有其精华和糟粕，不同的文化只有在比较鉴别中才能扬长避短。他期望通过自己对某一段历史的独立思考，对某一历史人物的独到观察，给今天的人们打开一个新的思想空间，提供一种新的读史理念，用理性精神建构现代公民价值观。在王龙的观念中，假如历史创作失却或淡化了自身的社会性、批判性及强烈的公众意识，那就等于丢弃了灵魂，成为一种过眼云烟的“无骨状态”、一种恶搞嬉皮的文字游戏。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读王龙的历史文学作品，既有深厚的家国情怀，更有难得的血性与温情。他的作品总有那么一股浓得化不开的悲天悯人之心。无论帝王将相还是末路英雄，无论是世界文豪还是一代枭雄，王龙都不想把他们抬高到云中的仙台焚香膜拜，也不打算将之丢弃在历史的暗角任唾沫掩埋。比如在写作《天人交战的“盗火者”》一文时，王龙发现毕生致力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伟大思想家严复，居然深陷鸦片无法自拔，以残酷的自戕伤害了健康。王龙敏锐地触碰到严复一生深邃隐秘的精神黑洞：一边忧国忧民翻译惊世之作《天演论》，一边吸着鸦片难以自拔的一代宗师严复，内心充满了怎样痛苦纠葛的人生悖论？

王龙的笔游走于古今中西之间，博观约取，恨则深入骨髓，爱则眼含泪水。他如同一位天人交战的历史“穿越者”，时而推窗见海，时而游园惊梦，时而抚剑长歌。悲欣交集的历史剧场里，他是那位前排坐定、泪流满面的看客。

在一篇探索瞿秋白为何没有参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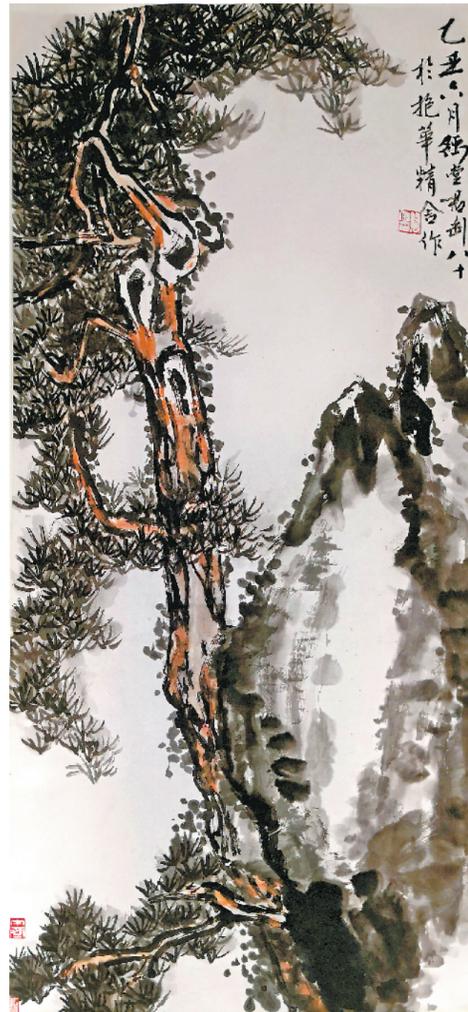
长征的文章中，王龙记叙了一个令人动容的画面：瞿秋白这位书生革命家站在萧瑟风雨中，孤独地目送红军战士长征远去的身影。那时瞿秋白明知留下来，就只有听任命运的摆布了，但他还是把自己身边一位身强力壮的马夫换给了年迈的徐特立，同时将自己最后一件长衫留给冯雪峰作纪念。瞿秋白深深知道，自己留下这些东西已经没有用了。可即使对革命有再多的迷茫痛苦，他依然如泰山黄河般忠于自己的信仰选择。瞿秋白先生从容赴死前那张最后的照片，曾无数次令王龙怦然心动、肃然起敬。历史除了是非黑白，更有灵魂风骨。宇宙茫茫，天地洪荒，中国人为何那么看重“粉身碎骨浑不怕，留取丹心照汗青”？王龙坦言，每当看到瞿秋白先生临刑前的那张照片，总感到岁月深处的千年雄风扑面而来，隐隐听到历史暗影里的虎啸之气。

中国是一个历史的国度。天地人物之变，兵火纷乱之迹，兴衰荣辱之慨……人类所能演绎出的一切悲欢巨变，无不曲尽精微，让人叹为观止。日拱一卒，不期速成。日积跬步，虽远毕至——在这种历史书写面前，读者和王龙一起经历了天人交战般的精神穿越。

文艺评论

松石图（中国画）

钱君匋作



长征

第四三五期